

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的光辉越灿烂。

——马克思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类观？

人类进入现代以后，出现了两股左右人类命运的潮流。一股是新技术革命潮流，短短几十年间，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几乎超过了这之前的几千年的总和；另一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潮流，短短几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人类实现了人类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几千年都未实现的伟大梦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人类真正成了用自己的双脚自由行走、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存在物。

新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的关系，使人类由自然界的奴隶变成了自然界的朋友；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人类与社会的关系，使人类由社会的仆人变为社会的主人。两股潮流从不同的方向汇成了展现人类本质强大力量的大海。时代把每个人推上来又压下去，就像海浪把每滴水掀到浪尖又甩向波谷。对此，有人说，人类已开始由自然的奴隶变成人类技术的奴隶，也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已开始由社会的主人变成社会的仆人。这说明人类已开始了对自己的成就的反思，而这种反思不能不导致对于产生这些成就的人类本性的探究。

……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出现了，与此相应的“人类意志论”、“内在攻击论”、“存在主义”也出现了；

……于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的一大错误”、“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压制‘个人’的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全面西化”等等思潮出现了；

由于这些“于是”，于是，有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和个别东方社会主义的学者，不谋而合，斩草要除根式地对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他们半是控诉半是劝阻地对人类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忽视了人的主义……

是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一方面给以认识 and 解决人类与社会形式的矛盾为主的近代史划了个句号，一方面又给以认识 and 解决人类行为与自身性质的矛盾为主的现代史写下了冒号。而这正好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肯定蕴藏着一个揭示了人类本性之谜和人类发展规律的“人类观”体系……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提出的课题

记得马克思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的时候，恩格斯在悼词中不无悲愤地说：“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无论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都争先恐后地纷纷诽谤他、诅咒他。”

自此，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百多年来，不仅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并没有停止“争先恐后的诽谤他、诅咒他”，甚至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已越来越想把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境”。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资产者和所谓的共产者，已经由诽谤、诅咒，变成了实际的“驱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马克思主义是不注重人的主义，

因而过时了”；于是，引发了一股思潮“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压制个人的主义，因而应当全面西化”；从而使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遭受内外两种势力的改变”的危机……

一 有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不注重人的主义

实际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一直都在遭受着两种人们的反对，一是那些张口闭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红旗”、一举一动都要到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查找（而且一定会找到）“证据”的人；另一种则是那些基于偏见和习惯，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疾恶如仇的“资产者”。由于人们有着相信真理、特别是曾被历史证实过的真理的天性，又由于任何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习惯或偏见，所以，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都可以因历史条件而形成一种思潮。

真理，是一种十分奇妙的玩艺。它既会因为人们曾经信奉它而成为“教条”，继而变成“皇历”；又会随着适用对象的转变或历史条件的变迁而“忽”地变成谬误。信奉真理的人们，更让人琢磨不透，他们能把一个真理从它生长和存在的体系中抽将出来，从而变成谬误，又能把一条真理到处乱用，从而变成一把丈量万物的“魔尺”。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人就是这样的人们，这些人们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真理。在那些“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红旗”的人眼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阶级与阶级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是用国家计划经济手段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效益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个人服从社会”、“全民服从政府”、“民主服从集中”、“自由服从纪律”的“社会至上”的主义。而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马克思主义往往同

“唯‘物’主义”、“暴政”、“流血”或是诸如此类的字眼——简言之，同所有邪恶和灾难的东西联系起来。然而，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埃利希·弗洛姆所说“对马克思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其他人对马克思的东西也是一知半解。要不是这样无知、有一定见识和理性的人似乎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歪曲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就是许多开明人士和那些没有如此歇斯底里情绪的人也相信，‘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把物质利益的关切作为人的主要推动力是在促进人的物质贪欲和满足”。这一长段引言中既有作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知”者对于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正确评价，也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无知”者的评价——马克思主义难道是主要地关切“物质利益”、促进“人的物质贪欲”吗？

综上所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一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评价——“斗争”或“流血”的主义、“社会至上”的主义、“唯‘物’”的主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不注重人的主义，或者如当代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让-保尔·萨特所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片“空场”。

二 有一种思潮：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压制人的主义

社会主义，严格地说是由巴贝夫等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后经过 C·付立叶等人的理论丰富和罗伯特·欧文的实践提炼，达到了比较完整的程度。但是，这一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理想化的空想的。最终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是人类对自身认识史上的一个大飞跃。这一理论一经被人类所认识，就形成了强大的实践力量。列宁很快地把它用于俄国，创立了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紧接着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是在血与火里诞生的，也是在血与火里发展的。先是希特勒的大炮轰、飞机炸、坦克轧，后是资本主义者的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和文化谴责。到了八十年代，外患犹在，又出现了内伤。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乌云密布，中国则一次接一次的刮起政治风波。多种迹象表明，社会主义正在经受着一场比面对资产阶级的大炮还要严峻的考验。

不是吗？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原以为我们在进行管理，而实际上已形成了列宁早就警告过的局面：汽车不是驶向掌握方向盘的人想去的地方。”（《改革与新思维》第 19 页）而在我国，毛主席也多次说不晓得“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

于是，西方一些知名思想家断言道，所有的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对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全力关注”，（《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年第 1 版，第 271 页）二是“完全忽略人”（同上）而这两点实际上就是“不注重人”这一点。他们论证说，由于“马克思过高估价了政治经济的措施”，“导致了由列宁发端的对社会主义的毁灭”，最终酿成了比“欧洲最反动的沙皇政府”还要反动的、“丧失了原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后一点内容”的“斯大林独裁主义”。

无独有偶，那些比如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些共产党人则公开提出“私有制宣言”，公开提出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错误，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则是导致中华民族错误的错误。因为，据说社会主义是只强调中央集权、没有人权、缺乏民主、不讲人道的主义。

总之，无论是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者，还是东方的一些社

会主义者，有着同一种判断：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还要残酷的剥削主义、政治上比沙皇还要残酷的专制主义、文化上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酷的文痞主义——一句话，社会主义是一种用“社会”压制“个人”的主义。

基于上述，于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者和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以法官自居，站在时代的法庭上宣判如下：

马克思主义——“当工人阶级受到残酷的剥削和生活在人的生存的标准之下时，这种批判是合情合理的。但随着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批判就变得过时了，它只是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姿态的一种逻辑结果，它向老百姓灌输一种胡说。”（《健全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88年第1版，第271页）

社会主义——“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它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但同任何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它也许更接近早期的和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它无止境地追求工业的发展，无情地漠视个人的存在，贪求个人的权力，这些构成了它的基本动机。”（《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版，第250页）因而应当“全面西化”……

……是啊，在有些西方资本主义者眼里，马克思主义就是歇斯底里的“‘胡说’主义”；而在有些东方社会主义者眼里，马克思主义就是惨无人性的“‘斗争’主义”。面对这种辱骂与歪曲，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庄严地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口号；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文艺家、思想家等，无不用自己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遭遇愤愤不平。有首题为《假如马克思……》的哲理诗写到：

假如马克思死后被请到了天堂，
肯定比任何神都尊贵和威严；

假如马克思是被发落到地狱，
一定比任何鬼都卑微和寒酸。
假如马克思至今仍活在人间，
断定比任何人都痛苦和艰难，
因为当年的资产者已“鸟枪换炮”，
对他也由诽谤驱逐变成了真枪实弹；
因为他又会痛斥张口闭口称他“祖宗”的人，
而这些人往往不是有名就是有权。

三 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热点’看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类观的重要性

与上述那种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作法相反，更多的严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是根据现代特点，从马克思主义丰富宝库中挖掘宝藏。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而其中每个领域都各有自己的研究“热点”，并且无一不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问题（如人类的本性和发展规律等等）的观点密切相关。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0 多年间，我国的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传统文化与时代的问题”讨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四个阶段。显然，这些讨论反映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不断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从哲学角度发现并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人类观的过程。正如有些同志在《10 年哲学发展的简要回顾》中所说的：“10 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是围绕着人和人的主体性从沉沦中崛起而展开的，是围绕着确认和高扬人的主体性而深化的。”（1988 年

12月12日《光明日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的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研究的热点也已由“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认识论”转向了“人是哲学的中心”论。甚至戈尔巴乔夫也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纲挈领地讲:“从原则上我可以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是清楚的。这就是要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35页)这样的“新思维”和这样的“改革”不是不促使人去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人类观问题。

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例。世界现代史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揭开的,自此,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列宁与布哈林的经济观点的争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的争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无不是围绕着这一“热点”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是计划经济,并以计划经济的纯洁性作为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经济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在于允许不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而在于把商品经济放在什么位置上。于是,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由单一的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轨”运动。这种“新经济”政策表明,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实行计划经济,一方面在企业或其他经济单位层面上实行商品经济;一方面在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问题上实行国家控制,

一方面在更多的问题上实行市场调节。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纯经济问题，但在它的背后则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类本性的问题。因为，从经济角度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所以优于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自己的计划经济来防止资本主义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分配上的两极分化趋势以及由生产的盲目性带来的巨大浪费，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员有着相对平等的就业权和分配权，这里显然体现了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性尊重；另一方面，实行商品经济，又可以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又体现了对作为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这种本性的尊重。人类的经济活动既是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生存活动，同时又是展示人性力量的创造性活动，而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恰恰实现了这种二重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必须静下心来，回过头去看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实思想……

第二节 科学发展的现实提出的课题

如何尊重并展示人类本性的问题，已成为现代世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全世界善良的对人类有着责任感的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地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在进入现代以后，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命运的迫切问题。

进入现代以后，不仅与人直接相关的具体科学（如解剖学、生理学、医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学等等）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一些直接研究人类问题的新学科（如思维科学、人才学、创造学、性格学等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了出来。更令

人欣慰的是那些始终与人类问题保持一定距离的所谓自然科学，不仅争先恐后地注入人文主义精神，而且许多自然科学家纷纷以人类的本性作为创立、拓展、评价自然科学的参照系。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科学局面，以至于常常使不分国籍和学科的科学家争相引用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128 页）

百家争鸣的科学局面，基于多向对立的科学观点，比如，生物学家在研究人时，就像研究青蛙和老鼠一样冷漠和无动于衷；语言学家则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蚊子和乌鸦的“语言”那样研究人类的语言。反过来，研究人类思维的科学家则举起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旗帜招摇过市；而研究人类性格的人则惶惶不可终日地叹道，超级大国的核心人物一发脾气，人类就得重新从“猴子变人”开始，甚至大炮会把地球变成蜂窝状。

面对现代科学提出的课题，我们也有必要去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诲。

一 自然科学已普遍渗入人类的本性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曾这样论述过人类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自然科学是人创造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描述和证明，并不是按自然‘存在’的那个样子。自然科学毋宁说是自然界和我们自身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因素。它所描述的，是那个受到我们询问，接受我们的方法的自然界。”（《现代哲学人类学批评》东方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0 页）他还曾提出一个被文化史学家 W·蒙赫称为物理学返回“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我们在量子论中用数学表示的自然规律，所讲的不是基本粒子自身，而是我们关于基本粒子的知识

……关于基本粒子的客观现实性的观念引人注目地消失了……（同上，第 61 页）这显然是一个否定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世界观。但它却折光地反射出了马克思给自然科学描绘的一个根本形象：它同时应当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众所周知，现代自然科学曾发生了一个由近代经典性质到现代非经典性质的历史转折。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还是玻尔的互补原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都告诉人们，我们不能排除人在自然科学中的存在，不能排除人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普利高津把“人类的历史”带进了物理学和化学，从而使自然科学越来越失去了它对“抽象物质”认识的纯客观形式。

自然科学不仅必然地要渗入人的能力，而且已越来越转回对人类的研究。严格地讲，本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如解剖学、病理学），只是在应用的或功能的意义上进行的。但是，进入现代以来，则转向以揭开人类之谜为主要目的。例如，人类环境学、计划生育学、社会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它们的主要学科特征就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直接地研究人类。

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还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越来越注意灌注人文主义精神。无论具有传统性质的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还是新兴的自然科学学科（如社会生物学）无不把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作为参照系。而所谓以“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云云，实质上就是以人类的本性和本性的发展为出发点。行文止此，我猛然记起了本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 1945 年底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诺贝尔聚餐会上的讲话：“物理学家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和诺贝尔很相像。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威力空前强大的炸药——一种特别有效的毁灭手段。为了削弱这个‘成就’为了宽慰自己的良心他创立了诺贝尔奖金，

促进和平事业……至今，我们没有和平的保障，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种种自由。仗是打赢了，但是没有赢来和平……”就在讲这段话的一个月前，爱因斯坦这位原子弹之父发出了“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的悲愤呼吁……

二 社会科学已直接指向人类的本性

自古以来的社会科学（比如哲学、伦理学等）从未直接的专门的指向人类自身，比如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哲学，包括近代的反省哲学都是在探究世界的本源、认识的规律时，仅仅“涉及”一下人的问题而已。但是进入现代以后，这些学科则直接指向了人类的命运和本性，从而表现出了从社会科学中分化出去的趋势。这些学科已在作为以直接研究人类为特征的人文科学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比如哲学，一方面分化出了哲学人类学——一门“关于人的本质和本质结构，关于人同作为万物的基础的自然界（无机界、植物、动物）的关系，关于人的形而上学本原质的起源和他在世界上的客观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开端，关于人受其推动和用以推动的力量和能力，关于人的生物学上的、心理的、精神历史的和社会的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的基本科学。”（《现代哲学人类学批评》第 21 页）另一方面，大多数哲学家则把哲学的对象直接指向了人类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不待言，就连一些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猛地“回味”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人是哲学的中心，哲学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人”（《论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研究》1987 年第 10 期）对哲学知识进行根本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应使这种知识得到重新建构，也即使哲学转向人文课题。（转引自 1988 年 8 月 22 日、《光明日报》）

除此之外的社会科学也已显示出了直接指向人类性质的趋

势。应当说，在进入现代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许多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等）是不直接面向人类的性质的，例如，经济管理学强调的是经济效益，把人当作发展经济的客观力量和控制对象；法学则一面强调社会秩序，一面把人仅仅作为法人来理解，等等。

然而，很快，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便感到，不从人类的本性来理解和建构自己的专业，将是所有观点的偏颇中的最大的偏颇。比如，美国艾肯电气公司的总经理 F·林肯就深刻地指出：“实业家全神贯注的是机器，忽视了人是机器的制造者和改进者，人显然还有比机器更大的潜能。他不会考虑到这个事实，有些尚未表现出来的天才人物就在他的厂里干着体力活，这些人既没有机会也得不到鼓励去发展他们身上的天赋才能，就连发展正常的智力和技能的机会也没有。”（转引自《健全的社会》第 243 页）又如，我国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厂长李大林指出：“当厂长的，就是要千方百计使每个成员发挥自己的才干……给他们舞台，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引自 1989 年 4 月 27 日《经济日报》）一个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企业家，说出如出一辙的管理学规律，不是偶然的；再比如，法学从古代的“刑不上大夫”，到近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口头禅的“道德法庭”，也已说明，在法律那冰冷严峻的条文里，业已渐渐注入人类的体温和人性的热情。

但是，社会科学关注人类的本性并不等于尊重人类的本性。由关注人类的本性出发，既可以导致利用人类的本性，又可以导向尊重和发展人类的本性。比如，F·林肯在同一部著作中认为：“不论好歹，自私是人类发展至今的推动力。因此，自私是我们必须依赖的力量，严格地说来，它是人类达到进步的领路

人。(《健全社会》第 244 页)用不着“听话听音”，这些话简直是“昭然若揭”地在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和技能，只有利用它，自己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钱。

可见，要想科学地评价社会科学的人文主义性质，我们必须求教于马克思主义人类观。

三 空前活跃的人类学

如上所述，人类学是一个研究人类的起源、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群，它的产生是人类从关注自然的古代经由关注社会的近代到达关注人类自身性质的现代的重要标志。截止今天，这门科学已发展出诸如哲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派，提出了或近似或相佐或截然相反的人类学观点。

面对五颜六色的人类学观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决定论的人类学，它包括或文化决定、或经济决定、或英雄决定的社会人类学，进化论—生态学的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或宗教决定或人性决定的精神学的人类学；第二类是非决定论的人类学，它包括偶然论人类学和统计学人类学。由于它们都说出了自己看到的人类问题中的一部分真理，至少揭示了人类产生、存在或发展中的确实存在着的事实。因此，他们各站一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例如，社会人类学，抓住了人类是社会性存在物这一重要性质，生物人类学则牢记着人类说到底也是自然性存在物这一重要性质，而精神人类学则死扭着没有思维和精神就无所谓人类这一重要性质。面对这些决定论人类学，非决定性人类学似乎更胜一筹地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而那种种决定论人类学正好生活在它发现的这片绿洲上。当然，还有一些哲学人类学家，他们自以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挖得

深些，一句话，更超脱一些。他们把上述人类学家所得出的个别结论像抹蛛丝一样撇开，似乎“高瞻远瞩”地发现了人类那种“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人类本性”的来笼去脉，而另一些哲学人类学家则像把望远镜倒过来审视人类一样，发现了人类“人类性质→社会存在→自然起源”的哲学性规律。

面对这些“各有千秋”的人类学观点，我们仿佛在哪里看到过，并且它们在那里却仿佛各有其合适的位置。——对，就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四 从现代科学的‘热点’看提出马克思主义人类观的重要性

人类做了些什么？人类为什么这么做？人类以后还将做什么？人类希望自己做些什么？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与人类怎么认识自己直接相关。进入现代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遍关注人类的问题，随着人文科学的兴起，一门直接研究人类本性的科学思潮豁然崛起。它一经出现，便作为“热点问题”引起世界科学界的普遍关注和介入。

这是由人类现代最著名的一批科学家、思想家掀起的一股旷日持久的科学思潮，并且是一股真正表现了现代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本质特征的科学思潮。古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近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也都有他们对于人类本性的理解。但是，把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提到如此显著的即主要的地位，则是顺应了人类发展的现实的现代思想家的功劳。比如，宗教早在古代就有了，在中世纪甚至达到了主宰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程度，然而，从人类的本性来了解宗教，只是现代思想家的事情。这些思想家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我们就会按照上帝的本性行事；反过来，如果我们认为人类

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那么，我们又会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进行思想、生活和劳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思想家们认为，问题不在于研究比如上帝有没有？而在于我们的本性为什么和怎么样地创造了上帝和上帝的权威。

纵观现代人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生物学出发来解释人类的本性，由此出现了比如洛伦兹的“内在攻击论”的人性论、斯金纳“行为条件论”的人性论，等等；再一类是从精神和心理学出发来解释人类的本性，由此出现了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的人性论、萨特的“无神存在论”的人性论，等等。再一类是从社会和文化出发来解释人类的本性，由此出现了比如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决定论”的人性论、埃利希·弗洛姆的“社会决定论”的人性论，等等。这些理论显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他们站在人类确实存在的一个方面揭示了人类的本性。但是这些理论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偏颇，因为他们都是用整体中的某一组成部分的质取代系统的质或整体的质，因而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到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思想深刻的学者为了克服这些片面性，提出了“综合论”的人性论。例如，爱德华·O·威尔逊在1978年出版了《人类的本性》，认为，人类的行为既不完全由遗传决定，也不完全由社会决定。而是表现为二者综合的“发展地形”的情形。他打了个比喻，人的行为如同一个球的滚动，既定的“地面情况”是由遗传限定了的，而环境则相当于作用在球上的推动力，球的滚动既不能超出“地面情况”的规定和限制，也不会超出作用力的方向和大小的限定。可见，在威尔逊看来，人与动物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只有程度上的、量上的高低，而没有质的不同。这样，人类的本性也就是那种由基因决定的自然属性。由此可见，“综合”是对的，而出